

中国名人大传

郑板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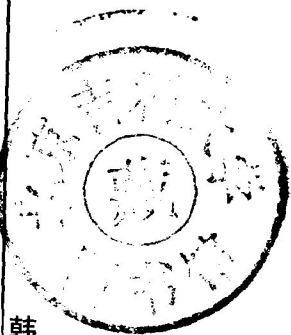
京华出版社

中国名人大传



* T135620 *

郑板桥



韩红著

传

京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名人大传/马道宗主编. - 北京:京华出版社,
2002

ISBN 7-80600-682-6

I.中... II.马... III.名人-列传-中国-古代
IV.K82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7739 号

中国名人大传

马道宗主编

京华出版社

(北京朝阳区安华西里)

(邮编 100011)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4600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印张 204.875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600-682-6/C·340 定价:1966.00 元(全 20 卷)



前 言

郑板桥（1693—1765年），名燮，字克柔，板桥是其号，偶而也题板桥居士、板桥道人，到了晚年，又自署板桥老人。他是清代杰出的艺术家、文学家。

郑板桥小时在家里，长期受到父亲的直接教育和舅舅的影响。二十岁时，板桥从真州回到家乡，投至陆种园老先生门下为弟子。由于板桥天资聪颖，学习勤奋刻苦，再加之陆老先生的悉心指点，他不仅精通了“四书”、“五经”，而且在绘画、书法、赋诗、填词等方面都小有名气，很快就成为当地有名的秀才了。

板桥二十三岁时，娶妻徐氏。婚后他们育有三个儿女，为了维持生计，板桥只得辍学。大约三十岁时，板桥的父亲去世了，家境更为艰难。

接着，他的独生爱子夭折。三十九岁时，伴他十几年的结发妻徐氏也不幸病歿。这一连串的变故，使得郑板桥对前途感到了悲观失望。在艰难困顿中，幸而有江西人程羽宸的慷慨帮助，才使他解脱了家庭的牵累，得以游历庐山、燕京、杭州等地。

雍正十年（1732年），板桥四十岁，赴南京参加乡试，中了举人。经过在焦山的借宿苦读，终于在乾隆元年（1736年）的京都应试中中了进士。但是直至乾隆六年（1741年），他四十九岁时，才被任命为七品县令，去山东范县就职。



郑板桥传

由于板桥办事公道，廉洁爱民，范县百姓都十分敬重他。在范县五年知县任上，他关心百姓的疾苦，做了不少有益于百姓的事。

乾隆十一年（1746年），板桥已五十四岁了。他从范县调到潍县当县令。像在范县那样，板桥常常穿着便衣到潍县四乡去访察民情、体恤民间疾苦，并且能秉公办事。

板桥敢于直面自己施政的失误。当时潍县社会治安较乱，每到冬天，便屡屡发生偷盗抢劫的事。于是板桥就招集当地人编成巡查小队，抓捕盗贼罪犯。然而事与愿违，队里有些人滥用职权，不去管坐地分赃的罪犯，却敲诈勒索无辜的农民，弄得百姓怨声四起。板桥发觉后，便派人暗中调查处理，并坦然检讨了自己的过失，解散了这个巡查小队。

他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十二年的官场生涯中，他从不送礼巴结上司，在处理案件时，对地方富豪和老百姓也一视同仁。特别是在灾荒之年，常不顾上司的反对开官仓济民，还命城内大户设厂煮粥，让难民度过难关。他的这些举动惹恼了上司与当地富豪，所以在乾隆十八年春，板桥竟以贪污赈灾粮款的罪名被革职。

于是，板桥又重返扬州卖画，不过此时已是今非昔比，远近官绅士民，都向板桥索画，让他甚为忙碌。

在这期间，板桥和“扬州八怪”两画家李鱓、李方膺交往甚多，成为知己。

此时的板桥，仍和青壮年时代一样，特别喜欢远游。回扬州的第二年春天，六十二岁的板桥就去了杭州。六十五岁时，板桥又去游高邮，写下了著名的《由兴化迂曲至高邮七截句》。

郑板桥的一生，经历康、雍、乾三代，先是康熙秀



才，后是雍正举人，直至乾隆进士，当了十二年七品县令，最后罢官而去，以卖画终了此生。板桥的生活，幼年极贫，中年稍富，晚年稍贫，他的生活的变化，对他个性的发展影响很大，使他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板桥可称得上是一位多才艺人。他在诗、词、曲和各种书札散文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大多数作品与当时社会现实生活联系密切，具有进步的思想内涵和极高的艺术魅力。同时，板桥的书、画、印俱绝，而且几乎凡画必题，题跋与画面组合，富有变化，而又极为和谐。他很好地处理了诗、书、画、印的关系，抓住了四者相通之处，提出了“真气、真意、真趣”这“三真”的说法。早在晚清，桥板书画就已举世闻名。



目 录

第一章 政治风云	(1)
一、清廷政治	(1)
二、石涛与扬州八怪	(8)
第二章 教馆生涯	(20)
一、幼年板桥	(20)
二、与竹结缘	(28)
三、板桥拜师	(35)
四、仕途梦想	(40)
五、贫士生活	(47)
第三章 扬州画师	(53)
一、古城掠影	(53)
二、寄居天宁寺	(60)
三、狂客京官梦	(67)
1. 扬州十载	(67)
2. 落拓燕京	(76)
3. 闭门苦读	(83)
四、乾旋坤转	(89)
1. 内忧外患	(89)
2. 道情十首	(97)
第四章 仕途金阶	(102)
一、金陵乡试	(102)
二、焦山读书	(112)



郑板桥传

三、考取功名	(118)
第五章 待宦岁月	(124)
一、情定饶五娘	(124)
二、怀才不遇	(132)
三、允禧荐友	(138)
1. 做客亲王府	(138)
2. 红颜知己	(143)
第六章 作吏山东	(149)
一、县令凿壁	(149)
二、巧断公堂	(158)
1. 僧尼还俗	(158)
2. 秦晋之缘	(168)
三、放翁习气	(172)
四、做官为苦	(178)
第七章 潍县清官	(183)
一、清官政绩	(183)
1. 潍县竹枝词	(183)
2. 微服私访	(190)
3. 开仓赈灾	(196)
4. 智惩奸商	(204)
5. 樵夫蒙冤	(208)
二、泰山封禅	(217)
1. 乾隆东巡	(217)
2. 解囊助读	(224)
3. 祸不单行	(231)
第八章 罢官潍县	(236)
一、无头女尸	(236)
1. 银匠入狱	(236)



2. 寻找人证	(245)
二、听差之死	(249)
1. 尹安失踪	(249)
2. 引蛇出洞	(257)
3. “青天”遇刺	(264)
4. 水落石出	(270)
三、为民除害	(280)
1. 法场风波	(280)
2. 去任归田	(283)
第九章 终老扬州	(288)
一、老友故交	(288)
二、卖画终老	(304)
第十章 高山仰止	(310)
一、文学	(310)
二、绘画	(316)
三、书法	(328)
四、题跋	(333)
五、印章	(339)



第一章 政治风云

一、清廷政治

明朝后期，宦官专权，朋党攻讦，政治十分腐朽黑暗，封建政权机构处于几近瘫痪状态。地主阶级，尤其是皇族，更加疯狂地兼并土地。明末，农民受野蛮的政治压迫以及残酷的经济剥削而穷困潦倒，严重破坏了社会生产力，以至水灾、蝗灾和瘟疫不断发生。濒临绝境的农民只有选择揭竿而起。崇祯初年，爆发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代表的农民大起义。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北京为李自成率领的大顺军所攻占，崇祯登煤山自缢，农民起义推翻了明王朝近三百年的统治。

也就在这年五月一日，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勾结满清贵族，引清军进入北京，大顺农民革命政权被颠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因而被夺取了。十月，清顺治帝下诏定都北京。

清朝廷从此开始了对南明残余福王政权、鲁王政权、唐王政权的攻伐。康熙元年（1662年）春，吴三桂在缅甸将桂王俘获。至此，终于彻底推翻了南明王朝在大陆的残余势力。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康熙到乾隆中期统一了台湾，平定了准葛尔部贵族的叛乱，抵制了沙



俄入侵我国黑龙江流域的举动。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

在南下进攻时，清军极为残暴。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尤其是清统治者下令薙发，强迫汉族人民改变衣冠装束及精神信仰，这就激起了广大汉族人民的坚决反抗。李自成、张献忠余部也联合南明政权共同与清为敌。以农民军为主体的各族人民的抗清斗争，进行了二十年之久，最后以被清王朝血腥镇压而告终。

清统治者为了缓和民族矛盾，对汉族地主官僚，在入关前后都执行笼络政策。当清军进入北京后，马上为崇祯发丧，而且以为汉族地主官僚“报君父之仇”的幌子，自我标榜为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在任用官吏上，清廷表面上采取满、汉兼用的方针，并且规定了中央各部门满汉官员的名额。

康熙时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缓和阶级矛盾，社会秩序好转起来，恢复和发展了生产力。乾隆时期，许多城市的商业繁荣发展，各地和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了加强，海外贸易也有一定的发展。这就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的又一个所谓“太平盛世”。

在康熙、雍正的上谕中，把地主当作“国家所爱养保护之人”，提出当使富民利益得到维护。这一时期所推行的废止圈地、减免税粮和鼓励垦荒等政策，都有利于汉族地主。清朝政府还采取其他许多措施，吸收一些汉族地主阶级中的知识分子到政权中来。在不断扩充科举录取名额的政策下，康熙十二年（1673年）又下令推荐“山林隐逸”，一些地主士绅可免试做官。第二年，清廷更颁布了捐纳制度，地主子弟便有了捐银得官的待遇。康熙十七年（1678年），又宣布开设“博学鸿儒”科，罗致了全国



“名士”一百四十三人，录取了五十名，他们都被授予了翰林院的官职。当时除了有较浓厚的反清和反对君主专制思想的人如顾宪林、黄宗羲等外，其他知名学者还有朱彝尊、汪琬、毛奇龄、施闰章等人都来京应试。清朝统治者还大力提倡程朱理学，积极收罗了李光地、魏裔介、熊赐履、汤斌等一班“理学名臣”，让他们纂修《性理精义》等书，颁布天下。康熙皇帝还在山东曲阜祭孔庙，在南京谒明太祖陵，企图推广理学的“忠”、“孝”思想，使人们的思想斗志被束缚、涣散。这样一来，便加强了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更加强化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器。然而“太平盛世”的景象仅为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而已。封建制度受资本主义萌芽、不断增长的市民、商人力量等因素冲击着。大官僚大地主兼并土地，饱食终日，骄奢淫逸；终岁勤劳的广大农民十分贫苦。清初的一些自耕农，到乾隆时期，有百分之五、六十的土地被富户兼并，这些土地被兼并了的农民沦为佃户，一年生产之后，仅可维持日常生活。这样一来，便加剧了广大劳动人民和清统治者的矛盾，人民起义此起彼伏。康熙、乾隆年间，就发生了广东、台湾人民反清斗争，湖北武昌绿营兵起义，山西蒲州人民起义，贵州、湖南等地苗族人民起义，云南李天枢等起义，山东堂邑清水教王伦起义，新疆乌什、甘肃循化回民起义，台湾天地会林爽文起义等。清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一方面采取高压政策，在政治上表现为武装镇压，钳制那些具有抗清思想的知识分子的思想。还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仍旧厌清思明，仍然坚持同清朝作战，如黄宗羲就曾经表示过：“狂言不怕山精漏！”于是，清统治者从顺治时代起开始制造文字狱，经历了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计一百余年，可谓史无前例。



郑板桥传

文字狱古已有之，但是清王朝的文字狱却是规模最大，处刑最重历时也最长久的一个。康、雍、乾三朝，先后发生的大小文字狱，史书中记载的就有七、八十起之多。最让人听起来吃惊的是：

康熙二年（1633年）浙江湖州富商庄廷钱请人增编《明书》，对明末天启、崇祯两朝的一段历史进行了如实的记录，包括建州卫与明朝政权的关系等，便被认为是蓄意反清。清廷把已死的庄廷钱开棺戮尸，还杀害了和此书有关的作序者、刻印者、校阅者、售书者、藏书者七十二人，还有几百人被发配到边疆充军。乾隆时代更是登峰造极，查嗣庭、吕留良、胡中藻、王锡侯、徐述夔等案都是震惊天下的“脍炙人口的虐政”。乾隆曾极为震怒，说：“乃尚有出身科目，名列清华，而鬼域为心，于语言吟咏之间，肆其悖逆诋讪怨望，……实非人类所应有。”近代陈乃乾编辑的《焚书总录》之中记载，在清代文字狱中，二千四百五十三种书目被全部销毁，抽毁书目四百零二种，销毁书板目五十种，销毁石刻目二十四种，总数将近三千种。至于因为文字受累，究竟有多少人人头落地，有多少人发配边疆，又有多少人被打入旗下为奴，其数目是永远不能统计的了。

另一方面，清统治者又采取“怀柔政策”：康乾两朝皇帝多次南巡，倡导师朱理学、八股取士、开设“博学鸿词”、编纂《四库全书》等，来安抚民心，扼制人们的思想，用功名利禄相诱，网罗天下知识分子，以此来巩固清朝统治。在这种封建文化专制主义下，相当一批知识分子致力于研究学习理学和八股文，以求出仕以维持生计，走上了读书、考试、做官的道路。康、乾间因书画篆刻的成就而登科第得官的就有毛奇龄、毛际可、高士云、王原



祁、蒋廷锡、沈宗敬、张鹏翮、邹一桂、张照、郑燮、董邦达、张鏐、钱载、张若霭、钱维城、梁同书、王文治、桂馥、余集、潘奕隽、黄钺、孙星衍、伊秉绶、张问陶、关槐、阮元、梅庚、李鱣、陆飞、王宸、汪承霈、张敬、钱维乔、缪炳泰、龚有融、王学浩等数十人。

这真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严峻的社会现实面前，知识分子大致又可分为三类：一类是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俯首乞怜的巴儿狗。比如康熙年间的李光地，当时官位很大，却是俯首贴耳的小人一个，全祖望《鲒埼亭集》中对他的行为进行揭露，认为没有什么人能比得上他的坏。赵执信《饴山文集·送晋二生归应乡试序》云：“今之学者，巧饰步趋，深设城府，貌柔而行乖，心烦而言寡，阳倚程朱为祖，阴奉张孔为宗，乃可以擅大名，久高位。”这几句话概括了康、雍、乾时代士大夫以理学为幌子而圆自己的仕途之梦的文人丑恶面目。

清王朝的两手政策，压制了政治、学术思想的发展，却造成了考据学的兴盛。这样，另一类人不问政治，不问现实，情愿将自己有限的岁月，埋头于故纸堆中，投入烦琐的训诂考证工作中去。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难处。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刑罚残酷。读书人因此人人自危，甚至有“终身不必读书，似我今日”之悔。他们不仅不敢多写诗文怕招惹祸端，甚至为避免触犯忌讳也不敢研究明末史事。于是，只好集中精力研究经学，从事校勘、笺注与名物考证工作，学者们既利用这种烦琐考证之风来远离事非，统治者也利用它来分裂知识分子同社会的斗争以巩固政权。清初以来的汉学和金石考据之学空前发展，产生了群星灿烂的“乾嘉学派”，这与当时精神上、思想上严密的控制不无关系。



这种政治状况也导致美术创作脱离社会现实，摹古思潮泛滥。在清初统治阶级扶持下的“四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王翥）摹古画派处于“正统”地位。到了清中叶，势力最大的是以学王原祁的娄东派和学王翥的虞山派，他们的根据地在北京、苏州、太仓、常熟等地。清代中、晚期画坛一直为这两派统治，山水画以黄公望为远祖，以董其昌为近宗，陈陈相因，造成一种因循守旧，无所变通的僵死局面。尽管清王朝十分严格地钳制文化思想的发展，仍旧有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和具有民主思想色彩的知识分子涌现了出来。这一类特殊的人物大部分都胸怀韬略且抱负远大，但出于强烈的民族意识，对清王朝的黑暗有深刻地感触，再就是由于个人不得志，陷入了无所作为的境地，这就使他们或混杂在芸芸众生中，或托身寺庙，经常陷于摆脱不了的精神苦闷之中。由于当时文禁森严，所以他们只能在笔墨之外寄托他们不满现实的满腹牢骚，创造了带有政治批判色彩的“狂怪”的文艺作品。在哲学界这样的特殊人物有颜元、戴震，文学家曹雪芹、蒲松龄、吴敬梓。这些在清中叶生活的思想家和知识分子虽分属不同文化领域却殊途同归——即全部有个性解放的要求，无情的揭露与抨击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

总之，战士、刽子手、奴才、市侩、狂生、理学家、考据迷等人物组成了“康乾盛世”的社会众生相。他们相互交织，清初的文明就是这样创造的。

说到当时的文明，最为人称颂的当属扬州地区了，那儿确实是人才辈出的好地方。清王朝由东北入主中原的几十年间，由于清廷在武力镇压农民起义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缓和政策，逐渐恢复了被严重破坏的社会生产力，以商业和手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城市经济发展迅速；



同时，也日益扩大了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通商活动。扬州就是得风气之先的地区之一。地处大运河与长江汇合处的扬州，历来是南北交通的枢纽，隋唐以来，“江淮之间，广陵大镇，富甲天下。”有人对扬州的描绘甚至夸张为：“维扬右都，东南奥壤。包淮海之形胜，当吴越之要冲，阊阖星繁，舟车露委。”当时流传有“扬一益二”的谚语，意思是说，全国之盛扬州当推为第一，益州（成都）为第二。清初的扬州，既有大运河航运，又是全国最大的盐业集散地，经济非常繁荣。雍乾年间，在扬州设立了全国盐务最高行政管理机构——两淮盐运使衙门。盐商官绅相互显摆奢华富贵，在这里建造了许多优美精巧的园林。扬州的繁荣还有乾隆一大功劳，他六次南巡均在扬州停留，对扬州经济有很大刺激作用。当时的扬州手工业十分发达，核刻、玉刻、瓷刻、木刻、竹刻、漆刻、牙刻、砖刻名目繁多，还盛产各种工艺品。现在故宫珍宝馆珍藏着的最大的玉雕《大禹治水》，就是由清代扬州的玉工审材度势、精雕细刻出来的。这种新兴的商业经济的繁荣，必然促使市民对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有更高的追求；尤其对于文化方面，他们要求用一种生动活泼的精神享受来替代原有的老一套。另一方面，盐商富贾生活上穷奢极侈，广筑园林，他们有的为美化环境，有的是为附庸风雅，而提倡书画，研究戏曲，这样，艺术也就成了商品之一。孔尚任曾打过这样的比方：“广陵为天下之大逆旅，凡怀方抱艺者莫不寓寄广陵，盖如百工之居肆焉。”瘦西湖畔汇集了大量的艺术家，鬻字卖画，发展了自己的艺术。如盐商推崇金农，黄慎从福建到扬州以卖画谋生，等等。如此一来便形成了扬州“人文鼎盛”的局面。江都人薛寿在《学诂斋文集》卷下《读书舫录书后》中曾自豪地说：



吾乡素称沃壤。国朝以来，翠华六幸。江淮繁富，为天下冠。士有负宏才硕学者，不远千里百里，往来于其间。巨商大族，每以宾客争至为宠荣。兼有师儒之爱才，提倡风雅。以故人文汇萃，甲于他郡。

乾隆时代扬州的经学确实是天下独一无二的。这不光由于当时文人辈出，如焦循研究《易经》，黄承吉研究文字，王念孙父子研究训诂，阮元研究名物制度，汪中辩明学术源流，都是自创新例；而且由于先前的经学研究过于烦琐，全然没有十七世纪学术思想界恢弘活泼的气象，扬州学者在这样的状况下，能对伦理方面的问题大胆披露自己的看法，继皖学戴震之后，严厉的批判了宋明唯心主义的理学。

二、石涛与扬州八怪

在严峻、高压的政治压力下保持人格独立的大有人在，仅在文艺方面，如果要说起康、雍、乾时期与扬州有关的人物，这个名单将会很长。诗人王士禛，戏剧家洪昇、孔尚任，小说家吴敬梓、沈复等在扬州都曾留下了自己的足迹。吴敬梓甚至死前几天与友人开怀畅饮时，还高诵唐张祜的“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诗句。程晋芳在《哭敏轩》中云：“生耽白下残烟景，死恋扬州好墓田”，说的就是这件事情。扬州地区的文士，如诗人吴嘉纪、史学家谈迁等在当时也名扬天下。清初，大画家石涛和尚多次来到扬州，从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起便在扬州定居，进行了不懈的创作，在这期间完成了很多优秀作品。石涛的